

中国与喀麦隆七十年来的文学交流史略

齐林东^①✉ &  GONONDO Jean^②

¹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中学, 中国

²University of Maroua, Cameroon

Received: 20/11/2022

Revised: 01/02/2023

Accepted: 12/03/2023

Citation: GB/T 7714-2015 (numeric, 中文)

QI L, GONONDO J. 中国与喀麦隆七十年来的文学交流史略[J/OL]. 中非研究学刊, 2023, 2(1): 109-126.
DOI: <https://doi.org/10.56377/jsas.v2n1.0926>.

摘要

作为亚非作家会议重要的组织国和参与国, 中国和喀麦隆在此盛会上有了重要的文学交流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自此, 开启了中国与喀麦隆七十年的文学交流史。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分析法, 通过文献查找、收集及分析的方法而获得资料。研究发现喀麦隆著名作家、政治家费迪南·奥约诺(Ferdinand Oyono), 文学家蒙戈·贝蒂(Mongo Beti), 本杰明·马迪普(Benjamin Matip), 恩格波特·穆恩(Engelbert Mveng), 茅盾, 巴金, 刘白羽, 郭小川等人是中喀文学交流的重要开拓者与践行者, 堪称“中喀文学交流的桥梁”。喀麦隆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在中国取得了一定进展; 中国文学在喀麦隆的学习与研究也逐渐发展起来。诸多文学形式的交流, 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喀麦隆文学、文化往来, 为双边友谊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 中国, 喀麦隆, 文学交流史略, 亚非作家会议。

^①齐林东, 男, 北京市顺义区第一中学语文教师, 曾任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对外汉语教师, 硕士, 研究方向: 语文教育、非洲文学。Qi Lindong, holds a Master degree, is a language teacher at Beijing Shunyi District No. 1 Middle School, formerly a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Confucius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Yaoundé II in Cameroon. His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African literature.

^②Gonondo Jean, 男, 喀麦隆马鲁阿大学高等师范学院汉语专业主任, 讲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 中文教育。Gonondo Jean holds a PhD degree in Education; he is currently a senior lecturer, responsible of the Chinese major at Higher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ou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nese literature, comparative education and Sino-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A brief history of the literary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Cameroon over the past seven decades

Qi Lindong & Gonondo Jean

Abstract

Cameroon and China, as important organisers and participants in the Asian-African writers' conference, have had significant literary exchanges and achievements at this even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a documentary analysis method, in which literature is searched, collected and analysed to obtain inform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famous Cameroonian writer and politician Ferdinand Oyono, the literary figures Mongo Beti, Benjamin Matip, Engelbert Mveng, Mao Dun, Ba Jin, Liu Baiyu, Guo Xiaochuan and others were important pioneers and practitioners of literary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Cameroon, and are considered to be "bridges of literary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Cameroon". The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Cameroonian literature has progressed in China; the study and research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Cameroon has also been developed. The exchange of many literary forms has strongly promoted the literary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Cameroon, making an indelibl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friendship.

Keywords: China, Cameroon, brief history of literary exchange, Asian-African writers' conference.

一、 研究背景

中非关系由来已久，中国与喀麦隆之间的交流往来也渊源颇深。原中国驻喀麦隆大使薛金维指出：“东方的文明古国与素有‘微缩非洲’之称的喀麦隆远隔千山万水，但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共同的发展目标将两国紧密联系在一起”。^[1]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合作论坛的实施推进，中非关系不断深化。在此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与喀麦隆关系也在不断升温、稳固。随着双边经济、政治、文化往来的日益密切，两国文学交流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此基础上，梳理双边文学交流的发展历史便显得非常有价值。

东方文学交流史的研究，由于文化传统多源，宗教信仰多样，民族语言各异，交通阻隔等因素的禁锢与影响，被一些学者视为畏途，难以发现其特点和规律性。如果能够大胆运用创造性的、科学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思维习惯从个人的心智形式与传统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大胆探索东方文学交流的内在规律性，一定会有新的发现。^[2]

“在所有的亚、非国家之间，其文化自古以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声气相闻，吸呼相通”。^[3]中国与喀麦隆文学交流发展历史亦是如此。探索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双边文学交流的史实，能够发现不少令人欣慰的地方。

“国家不分大小，文化各有特色，文学交流一样丰富多彩”。^[4]实际上，中国与喀麦隆建交之前便已发生了文学交流。亚非作家会议的召开把亚非国家与地区紧密联系起来，而作为亚非作家会议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中国作家和喀麦隆作家在大会上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关系，中喀作家们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畅想中喀文学命运共同体。喀麦隆著名作家、政治家费迪南·奥约诺（Ferdinand Léopold Oyono）是中喀文学交流的重要开拓者和践行者，堪称“中喀文学交流的桥梁”。1971年3月26日，在奥约诺的见证参与下，中国与喀麦隆正式建交，从此开启了中喀友谊之门，而中喀文学交流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七十年来，喀麦隆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在中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同时，诸多文学形式的交流，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喀麦隆文学、文化往来，为双边友谊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新时代，展望中喀文学交流发展前景，潜力巨大，未来愈发可期！

二、 中喀现代文学交流的缘起：亚非作家会议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后，亚非国家和地区的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促进文化交流的热情日益高涨。在此背景下，于1958年10月7日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塔什干，召开了极具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亚非作家会议。这是亚非国家文学交流的一次重大盛会，被誉为“文学的万隆会议”。此次盛会也是中国与喀麦隆文学交流史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中国与喀麦隆尚未正式建交，但在会议上中国作家与喀麦隆作家进行了直接面对面交流，在构建亚非文学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畅想中喀文学命运共同体，直面当时的国际社会与民族命运问题。

1956年12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一次亚洲作家会议时，苏联和中亚各国作家代表们提出1958年在塔什干召开下一次会议。1957年12月，在埃及开罗召开的亚非团结大会上通过号召与会各国作家积极参加塔什干作家会议的决议。1958年6月，中国与苏联、印度、日本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五国在莫斯科举行预备会，发表召开亚非作家会议的公报和告亚非作家书，并决定8月召开亚非作家会议筹备委员会。8月下旬，中国与喀麦隆等十个国家的作家相聚谋划，进行大会的筹备事宜。亚非作家会议于10月7日在塔什干的纳沃伊歌剧院隆重召开。中国与喀麦隆等亚非两大洲四十多个国家的两百余名作家们（还包括一部分欧洲和南北美洲观察员）相聚于塔什干，探讨亚非团结合作、和平繁荣、民族独立、反帝反殖等问题。中国派出了由团长茅盾、副团长周扬和巴金等21位作家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喀麦隆著名作家本杰明·马迪普（Benjamin Matip）在大会发言批判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无耻行径，并呼吁作家们为获得精神解放而斗争。中国的21位代表也均有作品及发言，《人民日报》、《文艺报》专门撰写《亚非作家们，高举反殖民主义旗帜前进！》和《高举反殖民主义大旗》的社论。中国作家出版社还专门出版《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介绍中国作家对亚非作家会议的论述。此次会议是亚非

文化交流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会议形成了著名的“塔什干精神”，许多作家认为塔什干会议标志着东方文艺复兴的开始，并将其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媲美，而这也是中国作家与喀麦隆作家友好交流的重要史实。

在亚非作家会议召开期间，各国作家起居生活于一处，更好地方便了作家们之间的交流。刘白羽、叶君健、戈宝权、郭小川等中国作家还特意与马蒂普等喀麦隆作家进行了深入交流，增进了中国与喀麦隆的交往与友谊。会议后，参加会议的作家们还撰文书写对此次会议的所见所闻所感，其中叙写了对喀麦隆作家们的印象与情谊。郭小川的《塔什干诗抄（四首）》其中一首便是写给喀麦隆作家马蒂普的《给马蒂普》：

“非洲，我们不了解你”
你这话儿还留在我的耳际。
是的，我们距离多么遥远，
你的国家对于我是这样神秘！

但是，在塔什干的花园里，
你一再地呼唤我为兄弟，
在你的明亮又锐敏的眼光中，
我天天感受到真诚的友谊。

你说：“非洲的根本问题，
就是反对黑暗的殖民主义！”
你说：“非洲人要解放，
不能缺少苏联和中国的支持！”

你憎恨非洲人民的公敌，
你讥笑那些怕西方的“战士”，
你知道谁是你的忠诚友人，
你年青的心对我们是透亮的。

我要说：非洲，我们了解你！
因为马蒂普就是非洲的儿子。
来吧，非洲，来吧！马蒂普！
中国人永远把你看作兄弟！^[5]

这首诗无疑是中国作家与喀麦隆作家交流与友谊的直接体现与最好见证。

1958年10月13日，为期六天的亚非作家会议闭幕。此次大会决定成立亚非作家常设局，常设局由中国与喀麦隆等十个国家的作家代表组成，中国与喀麦隆一道成为推动亚非文学交流的重要力量。亚非作家会议召开之后，中国《译文》杂志和改版后的《世界文学》杂志开辟“亚非国家文学专号”，广泛介绍亚非国家的文学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文艺

出版社也先后翻译出版了大批亚非作家的著作。在此背景下，亚非作家交流互访明显增多，这其中也包括中国与喀麦隆作家之间的交流往来。

1962年2月12日至15日，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在开罗召开，中国与喀麦隆等亚非国家作家再次欢聚一堂。出席此次会议的中国作家代表有：茅盾、夏衍、严文井、谢冰心、田间、杨朔、朱子奇、安波、叶君健、杜宣、王汶石、韩北屏、孙绳武等，茅盾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做大会主题发言。出席此次会议的喀麦隆作家代表有：奥山地·阿法那（Osende Afana）、玛特·穆米埃夫人（Mrs. Marthe Moumie）、恩德约格·阿洛伊·玛丽（Ndjog Aloys-Marie）、阿洛伊·玛丽（Mrs. Aloys-Marie）、巴霍肯·若望（Bahoken Jean）等。穆米埃夫人等人在大会作了发言，号召开展反帝斗争。《世界文学》杂志还专门刊登了穆米埃夫人等六个国家代表的发言。此次会议提出包括编写亚非百科全书、组织文学评奖、定期召开会议、开展翻译运动、增设宣传机构等一系列意见建议，促进亚非文学交流。会议期间，不少亚非国家还展示了一些代表作品及译介作品的成果，有力地促进了亚非地区的文学交流与合作，为推动构建亚非文学命运共同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决议象一座灯塔一样引导着亚非作家，赋予他们以巨大的力量，去按照自己人民的共同目标来安排自己的行动”。^[6]不过遗憾的是，会议所设想的很多意见措施因诸多原因未能具体落实，只能成为亚非作家们的美好憧憬与期待。

周恩来总理指出：“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亚非人民友好团结、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它将鼓舞亚非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的视野贡献出巨大的力量”。^[6]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欢呼并支持喀麦隆人民在喀麦隆人民联盟的领导下，为迫使英、法撤军，恢复民主自由，争取彻底的独立和真正的统一而进行的反对阿赫马杜·阿希乔（Ahmadou Ahidjo）总统傀儡政府的正义武装斗争。它将中国人民与喀麦隆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进一步促进了中喀文学交流与中喀人民友谊。

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后，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复杂变化，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于1966年6月28日在北京召开。有53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来到北京，形成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公报》等37个决议。会议主席、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宣布第三次亚非作家会议将于1967年在中国召开，但由于中苏关系恶化、文化大革命开始等原因，中国与亚非作家会议中断联系。

“无论亚洲作家会议，还是亚非作家会议，其实都不是一般意义的文学家的跨国联谊，都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都应放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状况中分析和解读”。^[7]不得不说，亚非作家会议带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文学色彩偏淡，这也是亚非作家会议没有能够持续维持的重要原因。虽然亚非作家会议持续时间较短，但在亚非文学交流史上却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为亚非国家团结一致反帝反殖民、追求民族独立自主起到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而作为其中重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中国与喀麦隆的文学交流也有了早期畅想中喀文学命运共同体的雏形，亚非作家会议背景下的两国文学交流必将载入史册。

三、 喀麦隆文学在中国

（一） 费迪南·奥约诺与中国

费迪南·奥约诺是喀麦隆最著名的作家、政治家、外交家。他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坛的杰出领袖，与喀麦隆另外一位著名作家蒙戈·贝蒂(Mongo Beti)一起被誉为“喀麦隆文学双星座”。^[8]同时，奥约诺也是喀麦隆政界的伟大精英，他的政治生涯长达半个世纪，先后多次出任驻外大使、驻联合国代表、政府部长等职。

奥约诺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除了他的作品在中国被译介研究之外^①，在长期的外交生涯中，奥约诺与中国打过很多次交道，他是中喀友谊的缔造者与见证者，也是中喀文学交流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在出任驻法国大使期间，奥约诺代表喀麦隆政府于1971年3月在巴黎同中国代表完成了两国的建交谈判，亲自开启并见证了中喀两国的外交往来。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他还曾陪同总统保罗·比亚(Paul Biya)访华，踏上中国的土地，对中国有了较为直观的认识与体验，增进了对中国的情感友谊。在多年的政治工作中，奥约诺多次代表喀麦隆政府促成或参与中喀交流活动，并签署了一系列的战略合作文件，有力地促进了中喀两国友好邦交。建交四十余年来，中喀两国在多项合作领域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奥约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中喀友谊关系贡献了力量，他是中喀两国关系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随着与中国接触交流的增多，奥约诺对中国也产生了颇浓的兴趣。他非常欣赏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与赞扬，并积极探索学习中国发展经验。对于中国援助非洲的诸多举措，奥约诺更是表达了无限的敬意，他曾多次亲自带领家人去看望在喀麦隆工作的中国援非工作人员，以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与关怀。同时，奥约诺还对中国民族文化艺术十分推崇，他对老庄哲学、儒家文化、毛泽东思想都有一定的研究与关注，并将其思想精华融入自己的工作生活中。他经常参加一些中喀文化交流活动，观看中国艺术展出、表演等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如：2002年8月26日至9月7日，中国著名现代书画家石翔书画国际巡回展在喀麦隆举行，当时担任文化国务部部长的奥约诺前往观看；2004年7月19日，在喀麦隆雅温得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刺绣展上，时任中国驻喀麦隆大使王四法陪同奥约诺欣赏苏绣作品^②。他还多次表示，希望中喀两国

^① 奥约诺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情况详见本文《喀麦隆文学译介在中国》和《喀麦隆文学研究在中国》。

^② 奥约诺参加活动信息记载来源于2011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和喀麦隆建交40周年》。

文学界能够加强对话与交流，构建包括中国文学、非洲文学在内的新的东方文学体系，并以自身实践开拓中喀文学交流发展，堪称“中喀文学交流的桥梁”。奥约诺对中国充满了深厚的情谊，他不愧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奥约诺逝世后，中国媒体第一时间对其逝世一事进行了报道，并表达了沉痛的哀悼和惋惜，这也充分体现出中国人民对奥约诺的关注与尊重。

（二）喀麦隆文学译介在中国

“文学交流和增强各个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并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最初和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互相翻译彼此的文学作品：小说、诗歌、剧本……”^[9]文学作品的译介自然也是中国与喀麦隆文学交流的重要形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受时局影响，中国掀起了一股翻译第三世界文学作品的高潮，亚非拉文学成为中国外国文学译介的重点对象。“当时中国对于非洲的关注首先是在政治方面，加之当时非洲整体还在西方控制下，中非之间没有正常的外交关系，也就造成了文学交流的薄弱”。^[10]即便如此，也翻译了包括喀麦隆作家本杰明·马迪的中篇小说《非洲，我们不了解你》和奥约诺的代表作品《老黑人和奖章》（*Le Vieux Nègre et la médaille*, 1969年翻译成英文版 *The Old Man and the Medal*）等在内的不少经典作品。

1958年，斐理翻译的本杰明·马迪普的中篇小说《非洲，我们不了解你！》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与当时很多非洲作品一样都是从俄文转译过来的。故事以先后受到德国、法国、英国侵略的喀麦隆为背景，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在这片土地上的残酷掠夺与殖民压迫。作者在开篇便指出：“无论如何，要把我们所不了解的非洲，这出戏整个地看完。由于它的沉默，连我自己也感到忐忑不安”。^[11]以此来唤醒喀麦隆读者与民众，鼓励他们积极投身到独立解放斗争之中。

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王崇廉从苏俄转译而来的奥约诺代表作《老黑人和奖章》。小说叙述了喀麦隆一个黑人农民麦卡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人生际遇。《老黑人和奖章》主要通过麦卡获得奖章前后的遭遇，鲜明地揭露出法国殖民统治者的丑恶面目，深刻地反映了殖民地人民觉醒的过程。小说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尤其重视麦卡复杂的心理变化轨迹，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脉络清晰，语言风格诙谐幽默，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值得一提的是，奥约诺在作品《老黑人和奖章》中还提及中国形象，“站在他旁边的一个象中国人的高个子青年”，^[12]虽然只是一笔而过，却是非洲现代作家对中国形象的早期认识。

为了表达对非洲人民英勇反帝反殖的同情与支持，1959年4月，《译文》杂志（1959年更名为《世界文学》）刊登了“黑非洲诗选”，其中包括喀麦隆诗人丁的《我们为自由而战》，有力地鼓舞了非洲人民的斗志。

“文革”十年，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陷入停滞状态。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翻译工作又一次迎来了春天，又一大批非洲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陈伯祥翻译的奥约诺作品《童仆的一生》（*Une vie de boy*, 1966年翻译成英文版*House boy*），是这一波当中的佼佼者。1985年，外国文学出版社翻译的“非洲文学丛书”中，李爽秋又重新将其翻译为《僮仆的一生》出版。

除了传统文学作品外，喀麦隆民间文学也同非洲民间文学一样十分发达。1981年《山花》第7期，刊登了英国女作家莱雷托·图德编著、徐用文翻译的喀麦隆民间故事《乌龟与野兔》，堪称“喀麦隆版的龟兔赛跑故事”。1986年，徐用文翻译的喀麦隆民间故事集《乌龟的故事》由新蕾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收集了包括《乌龟和老鹰》、《乌龟和猪》、《乌龟和象》在内的二十五篇喀麦隆民间故事，这些故事以动物为主角，带有浓厚的寓言特色，生动新颖，风趣幽默，通俗易懂，展现出喀麦隆人乐观开朗的性格特征。同时，这部民间故事集用讲故事的形式串联起来，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它为我们了解喀麦隆民间故事、研究喀麦隆民间文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进入新世纪，中国的非洲文学译介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些优秀的喀麦隆文学作品也随之而来到中国。2003年，汪剑钊翻译索因卡（Wole Soyinka）等编的《非洲现代诗选》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作品按照国别划分，展现了非洲各国的诗歌面貌，这其中选取了喀麦隆诗人埃拉隆克·埃巴尼亚·尤图（Elolonke Epania Yondo）、雷尼·菲隆布（Rene Philomba）和法朗索瓦·塞卡德-库（Francis Cengat-Kuo）的五首诗，这五首诗分别为埃拉隆克·埃巴尼亚·尤图的《睡吧，我的小宝宝》，雷尼·菲隆布的《宗教战争》、《火》、《和你一样的人》，法朗索瓦·塞卡德-库的《图腾语言》，这几首小诗丰富地展现了喀麦隆诗歌的艺术魅力。2013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查明建等翻译尼日利亚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C.L.英尼斯编的《非洲短篇小说选集》（*African Short Stories*），该作品集精选了非洲作家的杰出短篇小说，其中包括喀麦隆巴比拉·穆提阿（Ba'bila Mutia）的短篇小说《奇迹》（*The Miracle*），这部作品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叙事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2018年，尚金格编译的非洲民间故事集《胆小的王子》收集了撒哈拉以南非洲诸国的民间故事，其中包括喀麦隆的《名叫纳马拉索塔的男人》、《村子里的老鼠》两篇小故事，从中可以进一步窥见喀麦隆民间文学的智慧与精华。

（三）喀麦隆文学研究在中国

虽然建国初期中国便有了喀麦隆文学作品的译介，但真正的喀麦隆文学研究起步尚晚，且成果稀少，这与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状况如出一辙。

1960年新年伊始，法属喀麦隆托管区在联合国授权的托管协议结束后经全民投票决定正式成立喀麦隆共和国。消息传至中国后，随即有人引介喀麦隆文学。1960年《世界文学》第一期刊发了培明的《介绍奥约诺的〈老黑人和奖章〉》，对奥约诺的代表作品《老黑人和奖章》进行了简要介绍。这是喀麦隆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最早对喀麦隆文学的介绍研究，从此开启了中国的喀麦隆文学研究历程。

1978年第8期《外国文学动态》刊登《捷刊评喀麦隆作家蒙果·贝蒂的两部长篇小说》一文，引介了捷克斯洛伐克双月刊《世界文学》1978年第二期在书评栏内刊登的雅尔米拉·奥尔托娃写的文章《二十年后的蒙果·贝蒂》。在《二十年后的蒙果·贝蒂》中，奥尔托娃对喀麦隆著名作家贝蒂1974年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贝尔彼杜》和《牢记路本》进行了评论。《捷刊评喀麦隆作家蒙果·贝蒂的两部长篇小说》是中国学界少有的介绍他国喀麦隆文学译介研究成果的文章，实属难得！这也是中国、喀麦隆、捷克斯洛伐克三国文学交流的共同见证。

之后，中国翻译了两部重要的非洲文学史著作《非洲现代文学》和《20世纪非洲文学》，这两部著作是非洲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其中也有喀麦隆作家作品的介绍。1980年，刘宗次、赵陵生翻译的苏联伊·德·尼基福罗娃的《非洲现代文学》按照国别对非洲各国文学进行了大致介绍，在喀麦隆文学部分有对蒙戈·贝蒂、费迪南·奥约诺以及一些散文家的介绍。1991年，中国非洲文学研究专家李永彩翻译的美国伦纳德·S·克莱因主编的《20世纪非洲文学》，该著作同样分国别对20世纪非洲文学进行评述，包括20世纪喀麦隆文学状况，并分章节介绍了蒙戈·贝蒂和费迪南·奥约诺两位代表作家。这两部非洲文学史译著对于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96年第2期的《中外文化交流》杂志刊登了中国驻喀麦隆使馆撰写的《喀麦隆传统口头文学概述》，该文对喀麦隆传统口头文学进行了大致介绍。文章按主题和功能将喀麦隆传统口头文学大致分为三类：（一）史诗，确切地说是英雄史事与神话传说；（二）礼仪歌词；（三）通俗口头文学，如说唱故事、讲谚语、猜谜语、唱催眠曲、朗诵颂词等。文章指出，除了“三分法”外，有些学者将上述三类划分为宗教或严肃文学（史诗、礼仪歌曲）和世俗或轻松文学（说唱故事、讲谚语、猜谜语等）两大类。该文可谓研究喀麦隆口头文学与非洲口头文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2001年4月，新华社高级记者高秋福在2001年第2期《外国文学动态》上发表《喀麦隆文学双星座》一文，该文对费迪南·奥约诺和蒙戈·贝蒂两位作家进行了系统介绍。

高秋福于2000年3月访问喀麦隆，先后与两位喀麦隆最重要的作家面对面接触，并对他们进行了专访，时任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高铭君也应邀参加对奥约诺的采访。该文资料翔实，真实可靠，是研究费迪南·奥约诺和蒙戈·贝蒂两位作家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2004年，“中国文化非洲行”来到喀麦隆首都雅温得。7月23日，光明日报记者沈卫星采访喀麦隆作家协会主席、雅温得第一大学黑非洲文学教授巴斯卡尔·贝科洛，并在2004年7月27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中国文化正在世界发出响亮声音》介绍了此次采访内容。文章介绍，贝科洛曾于2000年10月以喀麦隆人民民主联盟中央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参加了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组织的非洲国家政党研讨考察团，开启了一次十余天的中国之行，并撰写了专著《中国之旅》。贝科洛对中国充满深情，专门向总统保罗·比亚递交了有关加强中喀关系的专题报告。文章还介绍了贝科洛对喀麦隆文学的三个阶段的历史划分：第一是殖民时期，第二是独立后的阶段，第三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非洲进入自由民主的时期^[4]。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姚桂梅、杨宝荣编著的《列国志 喀麦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对喀麦隆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科学、卫生、外交等各方面进行了梳理介绍，可以说是中国人认识了解喀麦隆的百科全书。《列国志 喀麦隆》第六章专门对喀麦隆口头文学、现代文学著名作家及作品进行了介绍。除了奥约诺与贝蒂之外，还谈及了杰姆巴·梅度（Jemba Medu）、弗朗西斯·贝贝（Francis Bebey）、雷内·费隆贝（Rene Philombe）、梅杜·姆沃莫（Remy Gilbert Medou Mvomo）、纪尧姆·奥约诺-姆比亚（Guillaume Oyono-Mbia）等作家及其作品，使人们对喀麦隆文学有了更多的了解。

2012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宁夏大学俞灏东等著的《非洲文学作家作品散论》对非洲作家作品整体进行了介绍，其中《黑非洲讽刺文学的杰出代表斐迪南·列奥波尔德·奥约诺》一节从奥约诺的生平与创作、讽刺小说《童仆的一生》、代表作《老黑人和奖章》三部分对其进行了介绍评述。

2012年，《中外文摘》第11期看法了胡继东《有四个妻子的喀麦隆教授》，介绍了喀麦隆小说家凯姆贡（即前文所提的喀麦隆英语文学作协主席约翰·肯贡·肯加松）的婚姻状况，并由此窥视喀麦隆的婚俗习惯与传统文化。

除了相关非洲文学著作、论文外，《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中外文学名家名著辞典》、《世界文学之旅》等工具书也有对奥约诺、贝蒂等喀麦隆作家作品的相关简介。这其中，1998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王逢振等主编的《新编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大词典》，介绍了贝贝（Bebey Francis）、贝兰加（Belinga Eno）、贝蒂、狄波科（Dipoko Mbella Sonne）、卡罗纳（Kalone Yodi）、卡约（Kayo Patrice）、奥约诺、奥约诺·姆比亚（Oyono-Mbia Guillaume）、荣多（Yondo

Elolongué Epanya) 等八位喀麦隆作家的生平以及他们的代表作品，该词典是介绍喀麦隆作家作品最多的工具书之一。同时，该书还介绍了 1970 年由包括帕特里斯·卡约 (Patrice Kayo) 在内的一群大学生创办的喀麦隆文学杂志《奥齐拉》(Ozila)，非常难得可贵。

另外，在《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学史论》等东方文学史教材中也零星提及喀麦隆作家作品。

2011 年至 2012 年，浙江师范大学齐林东在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担任对外汉语教师。在喀麦隆期间，齐林东先后结识喀麦隆英语文学作协主席约翰·肯贡·肯加松、剧作家布勒·布坦基 (Bole Butake)、小说家维克特·艾皮·勾姆 (Victor Epie Ngome) 等当地知名作家以及大作家蒙戈·贝蒂的夫人等，多次对他们进行采访与交流，建立起良好的友谊关系，并收集材料撰写发表了 Study Ferdinand OYONO in China (雅温得第二大学校刊 2012 年 9 月版)、《喀麦隆文坛骁将里努斯·阿松评介》(《外国文学动态》2014 年第 2 期)、《非洲文坛的杰出领袖——费迪南·奥约诺》(《世界文化》2016 年第 8 期)、《喀麦隆英语文学简论》(《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 年第 6 期)、《喀麦隆文坛领军者肯加松和他的“社会政治三部曲”》(《世界文化》2018 年第 10 期)、《蒙戈·贝蒂：“小非洲”走出的大作家》(《世界文化》2019 年第 2 期) 等文章。这些文章对里努斯·阿松 (Linus T. Asong)、费迪南·奥约诺、肯加松、蒙戈·贝蒂进行了细致的介绍，对喀麦隆英语文学进行了系统梳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喀麦隆英语文学简论》一文结合喀麦隆英语文学发展的实际，按照诗歌、小说、戏剧等不同文学样式分类介绍，着重谈及一些代表作家的作品，简要而系统地论述 1959 年喀麦隆英语文学产生至今六十年的发展状况，有效地填补了中国喀麦隆英语文学研究的空白，增进了对喀麦隆文学、非洲文学的认识与了解，为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借鉴。《喀麦隆英语文学简论》和《喀麦隆文坛骁将里努斯·阿松评介》两篇文章还被选入 2019 年 6 月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非洲国别英语文学研究》一书，该书将这两篇文章编入第四编《其他国家英语文学研究：初识“五虎上将”》，编者将喀麦隆英语文学与津巴布韦、索马里、博茨瓦纳、冈比亚英语文学并称为非洲英语文学的“五虎上将”。

四、 中国文学在喀麦隆

(一) 喀麦隆中学中国文学学习

恩格波特·穆恩 (Engelbert Mveng) 于 1930 年 5 月 9 日出生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附近的 Enem Nkal，是喀麦隆耶稣会牧师，他在艺术、历史、人类学和神学等不同学科方面具有创造性和多产的作家。

1972年他出版了《巴拉风》（*Balafon*），其中一首是写给不同地区的人民。在向所有民族单独致辞后，诗人在《集体的信》中向人类发出了和平和兄弟情谊的集体信息：人们应该像兄弟一样生活，无论其出身或肤色如何。通过这种方式，作者展示了一种包容所有文化差异的理解和爱。《集体的信》诗中，作者表示：

《致我的朋友孔夫子, Roland-Roger, Moteczuma》

我昨天收到了你们的友谊之信，
昨天晚上的黄昏，
我从地平线的四个角落收到，
你们的红金微笑，像太阳的告别。
你们对我说的是友谊...【.....】

你们问我是否在非洲人们爱你们...
我那些听着的弟兄们请我回答你们，
他们都爱你们
正如我们在非洲爱人。【.....】

我们爱人
因为是人，
只是因为他们是人。
像我们。【.....】

白色、黄色、黑色和红色，
你们在天空下，我们唯一的心
打击生命的节奏，【.....】^[13]

在《致孔夫子的信》中，在感谢孔夫子为他开辟道路，从而庆祝非洲和亚洲（在此以中国为代表）之间的兄弟关系之后，作者说：“我是花岗岩的佛”，“我是蓝河上的竹螺”，“我是你的莲花面纱的阴影”.....这种认同是非洲对中国与它的友好关系表示感谢和认可的一种方式。穆恩表示：

《致孔夫子的信》

我的朋友，孔夫子。
你向我敞开了门
东方的门，
随着太阳像成熟的果实一样迸发出来。
你向我打开了你的中国，
你的无边无际的中国，而我是花岗岩的佛，
在其千年的基座上，
我是宝塔，

而我是蓝河上的竹螺，
你的黄色河流，
在爱情上，我是你的莲花面纱的阴影
你的睡眠，掩盖了你的清醒，
我在你的爱上，
笑容在黎明时分的萌动，
摇篮曲，阵阵笑声，
涌动的摇篮上凄厉的啜泣声，【……】
叹息，像龙卷风，像水的喧嚣
分享你的淤泥的金色泥浆，
关于你的爱，东方，
我是这个夕阳的母爱
为你遮掩希望的曙光。【……】
你已向我敞开了大门
你的东方之门；
在竹子的窗帘之外和我埃塞俄比亚的脸的夜晚
你向我打开了你神秘的心，
我以你活的血肉之名为你命名，
而在我的灵魂中
我带着你灵魂的芬芳花束
我呼吸着千年来无数的香气，
我听你说，你对我说。【……】^[13]

他通过这首诗实现了非洲和亚洲之间的完美共融——“你向我敞开了门，东方的门”。喀麦隆诗人感谢中国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孔子向他介绍中国文化和历史。这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实际共融，更是两个文明之间的象征性共融。诗歌《巴拉风》多年来被喀麦隆中等教育部纳入全国高中教材列表中。

2017年，喀麦隆汉语学习者杜迪（Didier Nama）主编的面向喀麦隆中学生的汉语基础教材《你好喀麦隆》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套教材专门设有中国文学单元，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四个时期的分期介绍，使学习汉语的喀麦隆人能够对中国文学有简要而系统的认识与了解，促进了中国文学在喀麦隆的传播。

（二）喀麦隆大学中国文学学习与研究

2008年，马鲁阿大学高等师范学院建立，是当时唯一一家设立了三年制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的中西非地区高校（低级，为获得初中汉语教师资格证），专门培养中学汉语教师。2012年，第一届的14名学生顺利毕业，其中四名毕业生获得奖学金到中国留学，十名被分配到全国十个省试点中学任教，这标志着喀麦隆中学汉语教学的起步阶段。2014年，马鲁阿大学人文学院设立了三年制普通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当年，马鲁阿大学高等师范

学院又增设了两年制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硕士阶段的培养（高级，为获得高中汉语教师资格证）。

张馨月于2019年在《文教资料》期刊发表了题目为“国际汉语教学中文学课的课程设置及教材编写——以喀麦隆马鲁阿大学文学院中文专业‘中国文学’课程为例”。作者通过自身在喀麦隆马鲁阿大学文学课的教学经历为例介绍了本校中国文学教学现状及文学教材自编的一些原则。^[14]

2017-2018学年，马鲁阿大学高等师范学院设立了两年制学术性汉语硕士。当年招收了15名学生为本专业的第一届汉硕，培养课程大纲及研究方向包括：中文教学法、中文语言、中国文化及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方面的内容站全专业培养课程的不可忽视部分。马鲁阿大学文学院汉语专业设置的有关中国文学课程包括：中国文学（三年级上学期），中国当代文学（三年级文学方向下学期），文学批评及文学理论（三年级文学方向下学期），比较文学（三年级文学方向下学期）。而马鲁阿大学高等师范学院汉语专业开设的有关中国文学课程包括：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三年级上学期），中国文学：古代诗歌和当代小说（研究生一年级上学期），文学理论（研究生一年级下学期）。而汉硕开设了下列课程：古代中国文学（汉硕一年级上学期），中国文学史（汉硕一年级上学期），中国文学作品选读（汉硕一年级下学期），现当代中国文学（汉硕一年级下学期）以及文艺批评（汉硕二年级上学期）。现在，有些学生选择研究中国文学家作品，如余华的小说《活着》。

五、 其他文学交流形式

除上述提及中喀双边文学交流成果之外，中国与喀麦隆还有若干官方或非官方的其他文学交流形式。

为加强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和促进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两国政府于1984年缔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喀麦隆共和国政府文化协定》，从官方促进双边文化、文学交流。2007年，国家汉办在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建立孔子学院，推广汉语、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此过程中，汉语教师们还教授喀麦隆学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每年，有不少喀麦隆学生会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这些留学生大多学习语言、经济、政治、教育等专业，但受到中国文化、文学的熏陶与影响，这也能够让他们增进了解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而前往喀麦隆任教的对外汉语教师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些许喀麦隆文学，成为双边文化交流的使者。

近年来，随着中非关系的深化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中非影视合作也迈入新时代。在喀麦隆，中国武侠影视剧广受欢迎，喀麦隆人民对中国功夫印象深刻。此外，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在中国和坦桑尼亚举办第一届、第二届中非影视合作论坛的基础上，于2019年7月在喀麦隆举办第三届中非影视合作论坛，这无疑会进一步促进中喀影视合作，也能够促进中喀影视文学交流。

随着人们物质文化水平的提升、交通的便利与双边交流的不断增多，中喀双边因公或因私旅行往来增多，作为其产物的游记文学正在逐渐成为双边新的文学交流形式。一些驻非使馆官员、驻非单位工作人员、旅游爱好者以及因差旅非人员等根据所见所闻所感所著的旅非游记文学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李东山的《情系喀麦隆——中国医疗队援外纪实》、蒋玲月的《非洲双城记》等，这些作品都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讲述了在喀麦隆期间的故事及生活所感。而喀麦隆来华人员的游记随感也同样值得注意，如巴斯卡尔·贝克洛·贝克洛(Pascal Bekolo Bekolo)的《中国之旅》等，介绍了作者访华期间的所见所闻，赞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从喀麦隆政党领导人角度将中非发展进行了对比与研究。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游记文学产出，这势必会成为双边文学交流的一种崭新的而不可忽视的力量。

六、 新时代中喀文学交流展望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合作论坛的实施推进，中国与喀麦隆外交往来也迈进新的时代，双边关系不断紧密深化。整体而言，当前中非交流合作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医疗、教育等领域，文学交流并不尽如人意。应该说，中喀文学交流还存在诸多不足，中国了解喀麦隆文学者以及喀麦隆了解中国文学者少之又少，双边文学交流有待于进一步提升。“中非文化合作关系的建构在新时期面临着各种挑战，但是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外交中，政治与经济的交流合作比以往任何时代更需要文化和智力的支撑”。^[15]为此，新的时代，双边文化、文学交流亟待提升。

首先，双边应加强文学翻译与研究。一方面，推进中国的喀麦隆文学翻译与研究。当前，虽然中国有一些喀麦隆文学翻译与研究的成果，但相比于对西方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只是寥若晨星。做文学研究，需要文学翻译先行，这就需要外语的介入。除了英语、法语外，还应加强喀麦隆本土语言学习与掌握。非洲语言研究专家奎西·克瓦·普拉(Kwesi Kwaa Prah)指出：“不使用非洲语言，非洲就不能发展。因为语言是文化的核心，它联系着人们生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方方面面……语言是应对非洲发展面临挑战的关键”。^[16]喀麦隆是世界上为数不多使用英法双官方语言的国家之一。除此之外，还有286种民族语言，但均无文字。^[17]不少喀麦隆文学作品中夹杂着本土语言，要想真正掌握作品的内涵，需要了解喀麦隆语言文化，惟其如此，方可更好推进中国的喀麦隆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另一方

面，要大力实施中国文学“走出去”发展战略，推动喀麦隆汉学发展。随着喀麦隆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喀麦隆人在学习汉语语言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理应借助“汉语热”的东风走进喀麦隆。

其次，应加强双边作家学者的互访互动交流，组织召开学术会议等活动。当前，大部分非洲作家、学者对中国文学尚不了解。而中国的当代作家、学者也对喀麦隆文学缺乏应有的认识 and 了解。为此，加强双边作家学者互访互动交流，组织召开学术会议等活动显得非常有必要。2012年10月，非洲大陆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尼日利亚作家沃勒·索因卡访华便是非常成功的范例。而当年奥约诺访华虽更多出于政治原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随着双边关系的密切，理应增进互访互动交流，构建中国人心中的喀麦隆形象和喀麦隆人心中的中国形象。

再次，双边可成立研究机构，如在中国成立喀麦隆文学研究中心，在喀麦隆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中心等，努力构建中喀学术共同体。目前，在喀麦隆设有外国文化中心的国家有法国、德国、美国等。这些值得双方借鉴学习，以此为平台传播文化，增加双边文学认知与了解。同时，要努力培养相关研究人才。在此方面也可以孔子学院为依托，培养喀麦隆的汉学家。被誉为“体现南南合作精神的典范”的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培养了一批汉语通，在喀麦隆当地有着良好的社会影响力，在推动中喀教育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天然优势资源应成为中喀文学交流的重要平台，舞动出更多的文学交流活动。在中国，2019年4月9日，中国非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中国非洲研究院汇聚中非学术智库资源，增进中非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中非和中非同其他各方的合作集思广益、建言献策，为促进中非关系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而近年来中国若干高校开始建设非洲研究学科或机构，这无疑会有助于中非人文交流合作，也能带动中国喀麦隆文学的交流与合作。

与此同时，应借鉴西方与喀麦隆文学的交流经验，不少喀麦隆文学作品都在法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版社出版，而这些国家的喀麦隆文学研究也颇有成果，这些无疑值得中喀学习。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学习并不意味着模仿，双方应当在借鉴的基础上，超越非洲范式，开创属于中国与喀麦隆文学共同体的文学交流自信。

“未来中喀文化的交流合作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拓宽新的领域、提出新的方法、实施新的途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为中喀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文化上的保障和智力上的支持”。^[18]在传统文学交流形式之外，还需借助人工智能、网络科技积极探索开辟多渠道、多形式的文学交流合作形式。这些既是文化外交的组成部分，又是人文交流的重要形式。

当前，中国的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存在诸多不平衡现象，就国家区域研究而言，无论是通观论述，还是个案探索，主要还是集中在那些与中国文化交流历史悠久的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越南、印度、俄罗斯等国，以及西方主要经济、政治大国，如美国、英国、

法国、德国等。由于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诸多原因，学界对喀麦隆这样的国家研究尚少，且存在诸多研究空白。中喀文学交流，是中外文学交流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喀双边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研究展现中国喀麦隆文学交流的史实，开拓中外文学交流的学术领域，也将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并为双边往来提供有益的参考。为此，梳理中国喀麦隆文学交流发展史显得颇有价值。

“文化，将成为当前研究有关国际关系、国际安全和世界经济等问题的著作中最时髦的概念”。^[19]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与中非合作论坛的推进，中喀政治、经济交往合作越来越密切。2018年3月，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第五次正式访华，再次掀起中喀关系热。作为中喀友好合作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喀文学交流潜力巨大，大有可为！而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喀文学交流史的梳理，也必将助力中喀文化交流，巩固中喀友谊。期待更多的中国人民与喀麦隆人民能够更好领略双边文学的独特魅力，而中国与喀麦隆文学交流也必将迎来新的春天，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结论

本文主要探讨中国与喀麦隆七十年来的文学交流史略。本项研究发现早在1958年10月7日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塔什干会议上中国作家与喀麦隆作家已经开始进行了直接面对面交流。中国和喀麦隆通过面对面交流、学习、研究、翻译等方式相互了解，进行文学交流。文学交流不仅仅是作者之间的实际共融，更是两个文明之间的象征性共融。中国和喀麦隆文学交流还存在诸多不足，中国了解喀麦隆文学者以及喀麦隆了解中国文学者少之又少，双边文学交流有待于进一步提升。

参考文献

- [1] 黄舍骄, 贾如梅. 中国和喀麦隆建交40周年[M].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
- [2] 孟昭毅. 东方文学交流史[M].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 [3] 郑振铎. 进一步展开亚非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工作, 史学双周刊社编: 《中国和亚非各国友好关系史论丛》[M].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57.
- [4] 丁超. 中罗文学关系史探[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 [5] 郭小川. 给马蒂普[J]. 诗刊, 1958(11): 57-58.
- [6] 亚非作家会议中国联络委员会. 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文件汇编[M]. 作家出版社, 1962.
- [7] 王中忱. 亚非作家会议与中国作家的世界认识[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2): 66-84.
- [8] 高秋福. 喀麦隆文学双星座[J]. 外国文学动态, 2001(2): 17-20.
- [9] 世界文学社编. 塔什干精神万岁[M]. 作家出版社, 1959.

- [10] 殷明明. 非洲文学在新中国的出版及其特点[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5): 143-146.
- [11] MATIP [马迪普] B. Afrique, nous t'ignorons! [非洲, 我们不了解你!][M]. Paris: Éditions René Lacoste & Cie, 1956.
- [12] OYONO[奥约诺] F. Le vieux nègre et la médaille [老黑人和奖章][M].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
- [13] MVENG E. Balafon[M]. Yaoundé CLE, 1972.
- [14] 张馨月. 国际汉语教学中文学课的课程设置及教材编写——以喀麦隆马鲁阿大学文学院中文专业"中国文学"课程为例[J]. 文教资料, 2019(5): 30-31.
- [15] 刘鸿武. 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M].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 [16] 刘海方. 非洲的发展离不开非洲语言[J]. 西亚非洲, 2004(6): 69-70.
- [17] 姚桂梅, 杨宝荣. 列国志·喀麦隆[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 [18] 周海金. 论新时期中喀文化交流与合作[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4): 16-20.
- [19] 麦哲, 谭晓梅, 潘忠岐. 文化与国际关系: 基本理论述评(上)[J].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7(4): 13-17.